

保家卫国 笔为枪

（上接9版）新华社记者徐熊传染上斑疹伤寒，病倒于战地，在志愿军战地医院抢救下获生，但有半个多月时间他一直处于昏迷中，在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向后方医院转运，回国休养一段时期之后，他再次入朝参加前线报道工作。

在前线采访的新华社战地记者，体力消耗很大，需要定期回国休整，但由于没有更多的军事记者替换，志愿军总分社的很多采编人员都始终坚守在朝鲜，直到停战才回国。

不朽的文铭记不朽的名

黄继光 邱少云 杨根思 罗盛教……新华社不少报道名篇被收入教材、拍成电影

“在朝鲜北部成川郡石田里奇洞山的南山坡上，有一座新建的坟墓。一个多月，凡是在这座墓前经过的军民人等，都怀着崇敬的心情走上墓基，凭吊这位埋葬在朝鲜土地上的中国英雄——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师侦察连文书罗盛教同志。……”

这些文字，几代中国人都并不陌生。这就是后来被节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的长篇通讯《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记述了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舍身抢救落水朝鲜少年的英雄事迹。

这篇电文是新华社记者戴煌于1952年2月4日从朝鲜前线发回的报道。

“1952年1月26日下午，正在平壤附近一个山村里的志愿军某部驻地采访的戴煌，接到普金的电话，要他赶往一百几十里外的成川郡石田里，去采访志愿军战士罗盛教的牺牲事迹，要求越快越好。”多年前，万京华曾经在北京寓所采访了当时健在的戴煌老人。

“这四匹马老实，你就骑它。”戴煌当年回忆，接到报道通知正是严寒，到处冰天雪地，路非常难走，部队又派不出车。团政委刘玉堂让战士牵来一匹不起眼的老白马对戴煌说。

就这样，在经历了从马上跌落拖行、徒步翻越雪山，连夜穿行满是积雪的陡滑山路，这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曾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采访报道的新华社记者，在27日夜抵达罗盛教烈士生前所在部队的驻地。

采访期间，戴煌看到，村民们在罗盛教的墓前竖起了一块五尺多高的墓碑，用朝鲜文写着：“……生长在朝鲜土地上的人民，都应该永远地牢记着我们的友人罗盛教同志，学习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在翻阅罗盛教生前的日记书信时，戴煌更被烈士生前的一首短诗深深打动，“当我被侵略者的子弹打中以后/希望你不要在我的尸体面前停留/应该继续勇敢前进/为千万朝鲜人民和牺牲的同志报仇!”这些生动的素材都被记者引用到稿件中。

后来，这篇通讯经志愿军总分社编辑朱承修初编，又经过普金改定，用特急电发往北京总社。《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的报道经新华社播发后，很快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像《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一样，抗美援朝战争中，新华社很多新闻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上甘岭等战役的残酷和志愿军战士的忠勇；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罗盛教等志愿军战士的英勇事迹，就是通过战线上新华社记者的一条条生动的电文，一篇篇鲜活的报道，传回国内抵达读者而家喻户晓的。

1951年和1952年，总社特派记者华山曾先后三次到朝鲜前线采访。

“灯光又一闪亮。我也来得及看清了：布满大炸弹坑的稻田，炸裂的冰柱，黑压压一片惊慌的人影；挥锄的，挑土的，扛着土袋的，……深陷的车辙穿过奔忙的人丛。汽车又在黑暗中颠簸起来。‘这是敌机的重点封锁区。’团长安静地说。滥炸政策失败以后，敌机最近又来一套‘重点轰炸’，几架‘B二九’一早一晚，集中一点扔下几百颗大炸弹，硬把周围的地皮捣烂，炸飞，连路基也给抬跑了。可是汽车来往，只要文把宽的一条路面。工兵一阵突击道路又通了。……”

这是1952年5月26日播发，由华山采写的通讯《万里纵横到处家》。

1938年就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华山，是新华社著名的军事记者，曾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这样评价华山：“他的才华超过了我们同时代的许多人。”他的短篇小说《鸡毛信》和新闻特写《英雄的十月》分别入选小学和中学语文教材。抗日题材的作品《鸡毛信》还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影响了几代国人。

华山的战地通讯非常善于从整个战局着眼，通过细致化的文学描写，以及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使人们既能看清战争的形势，又有很强的可读性。

“抗美援朝期间，总社和总分社要求前线记者要多写短小精悍的作品，多写事实，多写典型，能精确及时大量地报道，还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采取多种新闻形式进行报道。”万京华说。

在1952年10月下旬到12月下旬上甘岭战役报道中，由记者石峰、王玉章



▲新华社记者郭普民，1951年8月在朝鲜牺牲。

采写的《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和通讯员郑大藩采写的《伟大的战士邱少云》两篇稿件，分别报道了黄继光用身体堵住敌人正在发射子弹的枪眼和邱少云为执行潜伏任务在熊熊烈火中牺牲的事迹，感动了亿万国人。

而“杨根思英雄排”的事迹报道，无疑是新华社记者华敏“抓住采访时机，掌握战报特点，积极完成采写任务”的一篇出色报道。

“作为新四军老战士，杨根思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曾接受过新华社胶东分社记者华敏的采访。”万京华说，杨根思牺牲前，当时华敏正在其所任部队采访，两人还曾交谈过。当听到杨根思壮烈牺牲的消息时，悲痛之余，华敏意识到应该马上投入采访报道。他曾说：“如果不抓紧时间采访战场目击者，等伤员转移后，可能根本来不及了解详情，那会贻误报道时机。”

华敏当即找到并采访了战斗中负伤的几位伤员，“他们都是亲历者，目睹了杨根思最后牺牲的壮举和战斗的经过。”很快，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三连连长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事迹，被华敏写成了一篇1000多字的通讯。

“敌人的反扑持续着，一次接着一，倒下的尸体迅速增加。杨根思的一排人也因英勇伤亡而逐渐减员。敌人多次反击无效，集中了重炮和B二十九型重轰炸机，将爆炸弹、烧夷弹，甚至汽油，都倒向这座小山顶，他们用成吨的钢铁来对付这一排人。……”

当他打出最后一颗子弹时，四十多个敌人已经爬近山顶。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根思握起了一包十斤重的炸药，拉响导火索，向敌群冲去。”

1950年12月24日，新华社发自朝鲜北部的通讯《不朽的杨根思英雄排》播发，在国内外传播开来，这是中国媒体在朝鲜战场上首次对外报道杨根思英勇牺牲的事迹。

后来，电影《英雄儿女》在拍摄时，导演和编剧在对志愿军英雄王成牺牲的细节进行具体构思时，部分取材于杨根思的事迹。

华敏曾告诉万京华一个细节：在杨根思牺牲前的那几天，华敏正在以杨根思为连长的某部三连采访，并与战士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天晚上，连队忽然接到战斗命令，大家马上进入作战准备。根据有关规定，打仗时记者不能直接上前阵地。一些战士来跟华敏道别，“华记者，这一去我们可能就回不来了！”华敏忙鼓励说：“你们一定要活着回来，我还要报道你们的战斗事迹呢。”

华敏和杨根思以饭碗相碰，为他和战士们壮行。随后，杨根思率领连队冒着风雪翻山越岭急行军前往前沿阵地。

“报道发出后，连杨根思所在团都还不完全了解他牺牲的具体情况。”万京华说，“如果不是记者身在前线，和志愿军战士同甘共苦患难，是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将这一消息准确报道出来的。”

血洒异国疆场

郭普民、高健飞、刘鸣、周斯杰、樊勋龙、马自亮、丁明7位新人为国捐躯

在朱承修的回忆中，1951年8月，刚刚进入朝鲜战场的经历刻骨铭心。

“8月24日晚上8时，我们乘坐东北军区派来的全新苏联嘎斯卡车，由一个班的警卫战士护送开往朝鲜。”之前，作为总社从华东总分社抽调志愿军总分社的4名工作人员之一，朱承修一行十几人先行抵达安东。

“由于没有制空权，我们都是晚上赶路，白天找地方休息。公路上每隔一段就布置有哨兵，监听有无飞机声音，如有情况，立即鸣枪报警。由于枪声频繁，走多远就要停车防空。”就在进入朝鲜的第二天夜晚，悲痛的一幕发生了。

“当时我们汽车正开着大灯猛驶，又一次响起防空枪。司机马上熄火，就在车子继续向前滑行的瞬间，我突然感觉自



▲新华社记者高健飞，1951年9月在采访途中牺牲。

己被抛了起来，腾云驾雾似的翻了出去。我立即意识到：翻车了！接着人被摔进一个积水的浅坑里。胸部和手上压着行李和器材箱。等我拼命爬起来时，就听见有人大喊‘救人’。”那是8月25日晚上9点半左右，朱承修记得很清楚。

借助手电筒的灯光，大家看到乘坐的卡车侧翻着，车帮下有两个人，背着身体，头部被死死地压住。“摔倒的人一拥而上，想把车翻过去，大家叫着号子，一次次努力，但车子纹丝不动。”朱承修说，两位同志就这样牺牲了。

由于天色太黑看不清，等站队点名时大家才知道，被压的是记者郭普民和一名警卫战士，另外还有两名警卫战士受了重伤。两位烈士被迅速掩埋在离公路不远的山坡上，两块木板就是他们的墓碑。直到朝鲜停战后，总分社才把两位烈士的遗骸迁至桧仓，安葬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翻车时，不少人受了伤，朱承修的两手也肿得厉害。于是大家在附近的老乡家里住下，直到9月15日，东北军区和志愿军总部才派车来接大家去桧仓。

“同志们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光明的路……”

这天是中秋节，车子一路向南。记者丁德润和高健飞领头唱起《光明赞》。朱承修写道：“当年行一个多小时，经过我们翻车的地方时，月光下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路边那两座坟墓。车里一片沉寂，大家默默脱帽悼念。”

抵达桧仓几天后，高健飞被调去开城。9月24日晚，他乘坐的美国小吉普在接近开城时遭遇空袭，疾驶的车子掉进了一条反坦克沟，高健飞被甩出车外牺牲了，那天是他们入朝一个月的日子。

“这么短的时间就有两名同志牺牲，这让我们大家非常痛惜。”朱承修曾感叹，“高健飞毕业于燕京大学，从北京相识一路同行到前线，他的勤奋刻苦和机敏干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停战后，由普金主持，高健飞的遗骸由开城迁至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

2011年，新华社建社80周年，曾在志愿军总分社工作过的记者李健华捐献了一个笔记本，它的主人就是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年仅24岁的新华社记者高健飞。李健华当时回忆，当年高健飞十分珍惜这个笔记本，本芯用完了，舍不得扔掉，将本皮拆下来，把裁剪好的薄纸加进去继续使用。

“新华社朝鲜前线二十八日电 德山里是朝鲜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它受到美国侵略者的蹂躏和凌辱，但是，它没有低头，它更加勇敢地站立起来，倔强地和美国侵略者斗争。”

当美国飞机侵入开城中立区第二次轰炸南日将军住所的消息传到村中后，十七岁的高中生、少年团员闵政英暂时丢下了他想做一个文学家的理想，第四次写下了要求参加人民军的决心书。

今天，在新华社社史馆里，大家仍能从那本字迹娟秀的笔记本中看到高健飞采写通讯《倔强的朝鲜人民》一稿中的重要素材。

1952年8月10日，新华社播发了新华社记者刘鸣采写的通讯《火线一夜话祖国》。其实，这篇通讯发出前8天，刘鸣已经在一次敌机轰炸中壮烈牺牲了。

“1952年8月2日上午，新华社记者刘鸣正在位于坑道式防空洞内，我志愿军西线某师前线指挥所值班室伏案写稿，一架敌机飞过该地上空，投下6枚炸弹，其中一枚炸弹在洞顶爆炸，防空洞顿时坍塌，刘鸣在爆炸中牺牲，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衣衫，染红了身边未完成的稿件。”

朱承修在《抗美援朝岁月追忆》一文中，记录了刘鸣牺牲的全过程。直到8月7日，新华社才以朝鲜前线电台陆续播出丁记者刘鸣之前采写的《美军第四十五师的命运》《火线一夜话祖国》。

“他的绝笔，牺牲时正在修改的稿件，未能从掩蔽部的废墟中抢救出来，和他一起留在了老秃山前线。播出的这两篇稿件，是他对新华社最后的贡献。”

1953年8月4日上午，新华社记者周斯杰随联合观察小组去东海岸江亭村



▲新华社记者刘鸣，1952年8月写稿时遇敌机空袭牺牲。

军事分界线与对方组员会晤，途中我方一辆卡车触地雷被炸毁挡在路上，导致后面朝中组员乘坐的车辆无法按时赶到会晤地点，于是有几个人乘坐前面带路的一辆吉普车先行前往，周斯杰本来不在那辆吉普车上，但他为了尽快前去采访和了解情况，在车子开动的时刻跃身跳了上去，车子开出百米左右触雷爆炸。

抗美援朝战争中，新华社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烈士有郭普民、高健飞、刘鸣、周斯杰、樊勋龙、马自亮、丁明。

“我这一生，值！”

“认真工作，认真生活，就是对那些逝去的战友最好的纪念”

“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初，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中央决定对外不公开发布任何消息。11月7日，第一次战役结束时，新华社播发电讯稿是首次对外报道志愿军入朝参战的消息，是毛泽东授意撰写并由他亲自修改审定的。之后不久，毛泽东又对朝鲜战场的军事新闻报道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并指出新华社应派记者去朝鲜采访发电。”

万京华介绍，自1951年1月起，志愿军总分社的建立，是新华社朝鲜前线报道工作逐步走向健全体制的开端。此后，新华社总社、地方分社、军队分社等陆续有很多记者、编辑及其他工作人员被抽调或随部队到朝鲜前线参加新闻报道工作。

据万京华介绍，派出之前，有的记者曾参加过短期学习，有的则是直接上了朝鲜前线。据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1953年2月9日的一份总结中表述，报道方面的工作人员基本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部队新华社分社调来，有解放战争军事报道工作经验，做新闻工作至少五年以上的人员；第二类是从地方新华社分社调来，有三年以上新闻工作经验的人员；第三类是从部队调来临时担任新华社报道工作的人员。

“新华社在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新闻报道工作的，还有从事对外、摄影报道的记者。这两部分业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属国际新闻局和新闻摄影局，1952年2月归并到新华社，成为对外新闻编辑部和新闻摄影部等。”万京华说。

作为新华社微纪录片《国家相册》的策划及讲述人，新华社高级编辑陈小波在2008年抢救性地主持了《摄影界》“口述新华”专栏，里面对参与抗美援朝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有过采访报道。

他们中有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一时间秘密入朝的摄影记者袁苓、杨涛涛，并在志愿军出国前回到北京，当时新闻摄影局把他们拍的照片发往国外，这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发布的第一批朝鲜战地新闻照片，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媒体纷纷采用。“美军战俘的家属还来信让他们帮忙打听亲人下落。那一次，袁苓、杨涛涛是追随朝鲜人民军南下最远的外国记者。”陈小波说，杨涛涛也是胶片时代新华社摄影记者中留下照片最多的摄影记者之一。

在“口述新华”里，入朝三年的摄影记者楚英曾拍摄了《1953年7月，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会师》的照片，他对朝鲜的记忆更多是“寒冷”，“刚进去时是9月份，光有一个棉袄，最冷的时候，连枪炮子弹都运不上去，更别说衣物了，那真是被冻坏了。”

2009年，躺在北京医院病床上，带着氧气面罩的楚英给“口述新华”在手掌大的卡片上写下了“忠诚无悔”几个大字。

1951年2月入朝，1955年8月回国的袁汝逊，在朝鲜期间拍摄了所在部队参加的第五次战役、交换战俘、中朝友谊、坑道战、钢铁运输线等照片。

他说：“最难忘的是1951年5月抢渡临津江。朝鲜冬天都在零下30摄氏度左右，5月以后开始零下几度，我们过江不敢脱裤子和裤子，水齐腰深。八一厂的两个摄影师都不会水，抢渡时他们把



▲新华社记者周斯杰，1953年8月在采访途中牺牲。

机器顶在脑袋上，我扶着他俩，水里全是冰碴子，到了对岸，裤子已经结冰了。”1951年底，钱嗣杰开着吉普车拉着记者徐熊和李秉衡从朝鲜北部前往开城，在崎岖的山路间遭遇敌机轰炸，“躲闪中，车被卡在一个巨大的弹坑中动弹不得，我猛一踩油门，汽车腾空而起，继续猛跑，呼啸的弹片在火光里乱飞，爆炸的气浪在开阔的地上翻滚。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有闯过去，中途还不忘拍几张照片。”

钱嗣杰，这名曾在“板门店谈判”时担任谈判代表团新闻处摄影组组长的新华社著名摄影记者告诉陈小波，“我这一生，值！”

“战争时期，每一张底片都带着血。”陈小波说，每当自己把老人几十年前拍的照片拿给他们看时，老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说，“比起那些早晨出去中午就再也没能回来的战友，能活到今天，已经是赚了。”

5年前，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辑罗婷因为“口述新华”，曾采访过参与抗美援朝的新华社老记者们，她说，老前辈们身上那种对待新闻理想的信念与追求，以及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的新闻是渗透着战士们鲜血的，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用血汗浇灌出来的。新闻不是个人的聪明才智，也不是个人的财富，更不能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成一老人说。

华敏老人谈得最多的是：“作为幸存者，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如今已经92岁的钱嗣杰，在之前的采访中曾对陈小波说：“我想，认真工作，认真生活，就是对那些逝去的战友最好的纪念。”

朝鲜停战后，新华社在志愿军的报道机构于1954年5月相应改为志愿军分社。1956年，志愿军分社撤销，由新华社总社解放军分社派记者李型常驻志愿军进行有关报道，直至志愿军部队1958年全部撤离回国。

“1996年，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与解放军军分社一起举行志愿军总分社部分老同志座谈会，当时来了很多老同志，曾经战场上的生死战友再相聚，大家都很激动。”后来，万京华也到过不少老人家里去采访，很多人已不能再出门。

“等到2010年，新华社再举行座谈会时，能来的老人已经少了很多。有人甚至穿上了曾经的旧军装，胸前佩戴上了各种军功章。”如今，万京华能联系到的老人已经没有几位了，后来曾任外交部副部长，96岁的王殊老人，今年9月刚刚离世。

2018年，新华社征集社史资料和文物，在朝鲜战场上曾经做过新华社通讯员的贺应芳，将保存的一张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发给她的油印的稿费通知单捐了出来。

1951年3月从家乡重庆应征入伍的贺应芳，是朝鲜战场上不多的女战士之一，作为所在部队的政治部宣传干事，她从一开始抄收新华社新闻，到成为通讯员给新华社写稿子，追随新华社记者采访，并在朝鲜的三年间深深地爱上了记者的职业。1954年，回到国内的贺应芳第一时间给新华社人事处写了求职信，并附上在朝鲜时的战地报道，就这样成了一名新华社记者。

2015年，新华社总编室的朱小燕曾以口述形式采访过朱承修，她说，总编室工作的年轻人基本上都认识这位关心国家大事和新华社事业发展的老同志，但对于他职业生涯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战地经历，却知之甚少，他也鲜对人讲。

“整个采访让我感动、震撼，数次落泪。”朱小燕说，“从朱老身上，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在新华社历史上，有一批像朱老这样的新闻人，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置生死于度外，冒着硝烟战火，以手中的笔和镜头为武器，为国家和新闻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用生命写下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对于今天的我们，他们是新华社的宝贵财富和厚重沉淀，是巨人的肩膀。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他们的峥嵘岁月，不仅是铭记，更是弘扬。”

方政军

2006年5月10日至17日，由时任新华社总编室副总编辑俱益军同志为团长，我和景如月、李志勇、陈必将等同志组成的新华社访朝代表团在朝鲜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访问，其中令人难忘的情景之一是瞻仰志愿军烈士墓，并为长眠于斯的新华社记者丁明同志扫墓。

离“三八线”不远的板门店附近，朝方安排我们瞻仰了开城的一处志愿军烈士墓群，在山峦环抱中，静静地躺着12个大墓，看墓的朝鲜老百姓说，每墓有烈士约四五十人。在一个小山坡上，我们找到了新华社记者丁明的墓碑，俱益军同志和我们以水代酒，洒在地上，表达和寄托着来自遥远的祖国和新华同仁的哀思。

从平壤到开城，仅有两个小时的车程，为守卫朝鲜人民的锦绣江山，从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的3年多时间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作为志愿军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来到陵园，我们的心情显得格外敬畏和沉重。在一个山岗上，立着一座石碑，上面用红色油漆镌刻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烈士永垂不朽”，代表团全体成员与平壤分社同事、朝中社同仁一起，向志愿军烈士碑静静默哀。

新华社记者丁明同志的墓碑后面写着：“事略：丁明同志，中国湖南省长沙市人，37岁，中国共产党党员。1951年7月参加开城停战谈判工作，因积劳成疾不幸于同年9月29日病故，特勒石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谈代表团全体同志谨志。1952年5月1日立。”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新华社先后派出50多名记者、编辑赴朝，组建了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包括丁明，新华社共有7名同志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在俱益军同志的带领下，我们沿着石碑缓缓地绕行一周鞠躬致敬，表达敬悼先烈之情。在开城志愿军烈士大墓群之外，另有零星小墓（有姓名），合葬的大墓只标记“烈士之墓”。据守墓的朝鲜人和当地外事局官员介绍，这里只有名单，分不清是谁，还有的只有衣物合葬于此，他们说朝鲜人民永远会守护好这些英灵。面对隐隐的青山和烈士大墓群，我不禁热泪盈眶，想象着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士兵，为了保卫和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欢呼声中，远离祖国和亲人，用小米加步枪对抗着“联合国军”的飞机大炮，最后长眠在异国他乡。他们从中国的农村大地走来，在帝国主义装备差距悬殊的条件下艰苦作战，视死如归。他们是平凡但最可爱的人。遥想当年，包括新华社记者在内，多少中国家庭父母送子奔赴前线，多少热血青年，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去不别，从此再也不能回到故乡和生他养他的父母身边，怎能不令人动情、痛心。望着阳光下淙淙的山泉闪着耀眼光芒，我的眼睛再次湿润了。

位于平壤的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气势恢宏，建于1953年8月，现址于1974年4月改建开馆，建筑面积52000平方米。令人震撼的是，我们在这里亲眼看到了邱少云烈士烧焦的棉衣肩章，黄继光烈士的奖状原件与水壶和毛岸英的墓碑。金日成1950年11月28日的现场指示：“我们要好好保护他的坟墓，战争结束后要搬到更好的地方去安置吧！”

我们参观了缴获的各种飞机、大炮、军车、炮弹、枪支，还看到了朝中社和人民日报刊用的新华社报道。

当年，新华社记者从朝鲜战场发回国内的许多战地新闻再现了志愿军战士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鼓舞了前线指战员和国内人民的士气，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罗盛教、毛岸英……众多平凡伟大的小人物感动了亿万父老乡亲和世界有识之士。正是战地记者的现场报道，让人们懂得了“谁是最可爱的人”。

之墓。方政军摄

朝鲜战地新华社记者丁明烈士之墓。

朝鲜战地新华社记者丁明烈士之墓。

朝鲜战地新华社记者丁明烈士之墓。

朝鲜战地新华社记者丁明烈士之墓。

朝鲜战地新华社记者丁明烈士之墓。

朝鲜战地新华社记者丁明烈士之墓。

朝鲜战地新华社记者丁明烈士之墓。

朝鲜战地新华社记者丁明烈士之墓。

朝鲜战地新华社记者丁明烈士之墓。

朝鲜战地新华社记者丁明烈士之墓。